

文学需要批评。这种批评既推动文学创造、传播与接受，又影响文学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当代中国文学的成长与发展，离不开文学评论的支持、鼓励和影响。愿这一系列丛书，能够引导读者审美兴趣，促进当代中国文学风尚转变……

霍俊明 著

萤火时代的闪电

——诗歌观察笔记或反省书



中国言实出版社

青年学者文库 14

文学批评系列

萤火时代的闪电

——诗歌观察笔记或反省书

霍俊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萤火时代的闪电：诗歌观察笔记或反省书 / 霍俊明
著. --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171-1876-3

I. ① 萤… II. ① 霍… III. ① 诗歌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4350 号

出 版 人：王昕朋
责任编辑：肖凤超
封面设计：王立霞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100101

编辑部：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100088

电 话：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32 5.125 印张

字 数 128 千字

定 价 24.00 元 ISBN 978-7-5171-1876-3

前 言

被刻意缩小的闪电

无论是西方的“水仙”还是中国的“屈原”，诗人在原型和人格上都被指认为是不健全的。“诗人”有某种特殊的天性。而这种天性在诗歌之外的日常语境中就成了根深蒂固的“痼疾”。这是否意味着在众多的文体中只有诗歌要去接受各种“悲观主义、讽刺、苦涩、怀疑的训练”？但不要轻易认为“大众”就代表了真理，大众所构成的“阅读民主”既可能是一种观察角度，也可能作为一种支配性的态度而成为偏见。

新诗一百年了！但是新诗仍没有建立起具备足够公信力的“共识机制”和“传统法度”。这该归罪于谁——诗人？诗评家？读者？教育？大众？一贯被指认为“边缘”“小众”“朦胧”的诗歌，其命运却是吊诡莫名的，在很多重要的时间节点上率先对诗歌发难的正是那些言之凿凿“读不懂诗歌”的社会、媒体与公众。那么，诗人之“原罪”何以发生？“大众”和公共媒体以及自媒体所关注的往往不是诗歌自身的成色和艺术水准，而更多是将之视为一场能引起人们争相目睹集体热议的社会事件——哪怕热度只有一秒钟。这可



能正是目前中国诗歌在写作、传播与评价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悲哀！甚至这份悲哀来得让人无言以对。那么多的局外人、陌生人和不懂诗歌的人却是对评价尤其是批判新诗充满了难以想见的热情。

而回到当下的诗歌现场，这似乎是一个热闹无比的时代，尤其在新媒体和自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诗人的自信、野心和自恋癖空前爆棚。面对着难以计数的诗歌生产和日益多元和流行的诗歌“跨界”传播，诗歌似乎又重新“火”起来了，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公众”身边。但是凭我的观感，在看似回暖的诗歌情势下我们必须对当下的诗歌现象予以适时的反思甚至批评。因为在我看来，当下是有“诗歌”而缺乏“好诗”的时代，是有大量的“分行写作者”而缺乏“诗人”的时代，是有热捧、棒喝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的时代。即使是那些被公认的“诗人”也是缺乏应有的“文格”与“人格”的。正因如此，这是一个“萤火”的诗歌时代，这些微暗的一闪而逝的亮光不足以照亮黑夜。而只有那些真正伟大的诗歌闪电才足以照彻，但是，这是一个被刻意缩小闪电的时刻。

是的，我们讨论新诗从来没有变得像今天这样吊诡而艰难。鉴于新诗话语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及愈益复杂难解的生态场域，那些持“纯诗”立场或“及物写作”“见证诗学”姿态的人们都有完备的理由来为新诗辩护。你可以认为诗歌就是纯粹自足的修辞练习，也可以认为是社会的回音室，但是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在于缺乏彼此信任和相互沟通的机制。对于新诗而言，任何一种观点、说辞、立场和姿态都会遭遇到其他论调的不满或愤怒。专业的读者和诗人、评论家一直语重心长甚至义愤填膺地强调或警告普通读者要“把诗当作诗”来阅读。可是真正把诗置放于公共空间，诗歌专业人士的“纯诗”愿望必然会落空。“纯诗”和“不纯诗”的相互博弈和胶着构成了诗歌史的两面。诗歌与批评、阅读的复杂共生关系是所有文体中最难以说清的。因为无论诗歌被业内指认为多么繁荣和具有

重要性，但总会有为数众多的人对诗歌予以批评、取笑、指责、攻讦。这就是“新诗”和“现代诗人”的“原罪”。

好诗的标准是什么？有没有一个既被专业人士认同又能够在最大面积的受众那里产生共识的诗歌评价标准？换言之，被指认为文学性要求最高又最为私密的诗歌如何能够有效地被社会公众认可？甚至被指认为“天才事业”的“小众”“精英”诗歌有没有必要“取悦”于更多的读者？而围绕近期被热议的余秀华、许立志等“草根诗人”，我们看到的是专业诗人内部对其诗歌美学的莫衷一是。既然连专业人士内部都没有共识又何谈诗歌写作和诗歌评价标准的公信力？这既在于现代汉语诗歌传统自身建构的不完善且尚需时日，又在于一些诗歌批评家和研究者们的话语幻觉。

很多诗歌批评家以为一篇文章能够引领读者和时代前进。而批评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大众对某位诗人、对过去某个时期文学的兴趣？批评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所处时代读者的趣味？艾略特的答案是：几乎没有。而事实上却是评论家一个个更像是站在舞台上的魔术师，手里拿着那顶黑色礼帽。他们用各种眼花缭乱又看似高深莫测的专业伎俩不断掏出花样翻新的东西。但最终，那顶帽子里却空无一物。

在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公众对诗歌的解读（误读）形成集体性的道德判断。甚至诗歌的历史由此会被修改。指认一首诗的优劣，评价一个诗人的好坏在很多时候已经不是问题。我们不要充当廉价的支持者或反对方，而应该去关注现象、问题背后的认知和评价机制是如何形成并发挥公众效力？更多的时候人们已经习惯将一首诗和一位诗人扔在社会的大熔炉中去检验，把他们放在公共空间去接受鲜花或唾液的“洗礼”。面对公共事件和个人的日常生活哪个更具有重要性？道德的天平和文学的准星该如何平衡一个诗人和诗歌从内到外的优劣？而对于中国文学场域来说，诗歌更多时候是

被置放于国家道德和民众舆论评判的天平上。

我们如何在一个诗人的生前和死后认认真真地谈论他的诗歌？如何能够有一个不再一味关注诗人死亡事件、社会身份、公众噱头的时代到来？反过来，需要追问的是中国百年新诗史上是否真正存在过一个阶段是完全的“纯诗”和“新批评”意义上的？恰恰相反。我们的诗歌历史总是在政治运动、诗歌运动和公众舆论中进行的诗歌讨论和争论。很大程度上诗歌的美学接受与社会因素很多时候是难以完全区分开的。当下，社会学批评、传记式批评、弗洛伊德性心理批评以及媒体批评正在大行其道。

诗人的个人才能与“传统”的关系永远都是实实在在的。面对自媒体阅读语境下诗歌的“原罪”、诗人身份以及涉及现实场域的“见证诗学”，面对着缺乏共识可言的激辩，面对着公信力和评判标准缺失的现代汉语诗歌，亟须建立诗歌和诗人的尊严。这既是美学的问题，又是历史的问题。来路正长！还是那个长久以来萦绕耳畔的疑问——诗人应该对谁负责？

“怎样才能站在生活的面前？”而在写作越来越个人、多元和自由的今天，写作的难度却正在空前增加。由此，做一个有方向感的诗人显得愈益重要也愈加艰难。尤其是在大数据共享和泛新闻化写作的情势下，个人经验正在被集约化的整体经验所取消。近年来诗歌乃至文学界讨论最多的就是“现实”“生活”和“时代”。如何讲述和抒写“中国故事”已然成为写作者共同的命题，无比阔大和新奇的现实以及追踪现实的热情正在成为当下汉语诗歌的催化剂。

很多诗人没有注意到“日常现实”转换为“诗歌现实”的难度，大抵忘记了日常现实和诗歌“现实感”之间的差别。过于明显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得诗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诗意提升能力受到挑战。这不是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感受力基础之上的“灵魂的激荡”，而是沦为“记录表皮疼痛的日记”。很多诗人

写作现实的时候缺乏必要的转换、过滤、变形和提升的能力。

在北京的城市空间，我偶尔会想起乡下院子里父亲和三舅亲手打造的那架松木梯子——粗糙、结实、沉重。它如今更多的时候是被闲置在院子里一个角落，只有偶尔修房补墙的时候才能派上用场。显然这架有着淡淡松木香味的梯子成了我的精神象征。在一个精神能见度降低的钢铁水泥城市空间，我需要它把我抬高到一个位置——看清自己的处境，也顺便望一望落日，看一看暮色中并不清楚的远方。我想这把梯子不只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更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诗歌就是生活的梯子——沉滞麻木的生活需要偶尔抬高一下的精神景观，哪怕诗意只是提高小小的一寸。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实际上是一条路。正如备受争议的余秀华说的“诗歌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也说不出，不过是情绪在跳跃，或沉潜。不过是当心灵发出呼唤的时候，它以赤子的姿势到来，不过是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走动的时候，它充当了一根拐杖”（《摇摇晃晃的人间》）。如今很多人已经不知梯子为何物。而对于诗歌而言，这一架梯子显然代表了写作的难度和精神方向性。当年的很多先锋诗人尽管目前仍然勉为其难地坚持写作（很多早已经偃旗息鼓），尽管他们也仍扛着或提着一个想象性的梯子，但是这个梯子更多的时候是无效的。因为在一些人那里，这个梯子不是来自于中国本土，而是来自于西方的材料。到了文学如此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个单纯由西方材料制造的梯子已经承受不起人们踩登上去的重量。而更多的时候这一诗歌的梯子也只是被提在手里，甚至更多的时候是横放在门口或某个角落——不仅不能发挥高度和长度的效用，而且成了庞大的累赘和摆设。

2014年的10月中旬，秋风渐起的时候我独自一人站在温州的江心屿和楠溪江，看着不息的江流我竟然在一瞬间不知今夕何夕。千年的江水和崭新的大楼同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是生活。在

那些迅速转换的地理和历史背景中诗人应该时时提醒自己和当代人牢记的是，你看不清自己踩着的这片土地，不呼吸当下有些雾霾的空气，不说当下体味最深的话，你有什么理由和权利去凭空抒写历史，以何感兴又何以游目骋怀、思接千载、发思古之幽情？

诗人，还是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地把文字揣在自己怀里，继续说“人话”为好。再一次强调的仍然是那句话——你必须站在生活的面前！

霍俊明

2016年2月于北京



CONTENTS

目录

二维码时代的诗歌：境遇、幻象与前景 //1

拟象的欢娱：影视空间与诗歌生态 //13

新世纪诗歌的现实感与地方性 //27

两个精神样本：雷平阳与陈先发 //49

“仿真”写作与无能的右手 //66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80

“70后”的“马灯”：一代人的写作命运 //101

那些恒星、流星、闪电或流萤 //109

“病人”“陌生人”或“赞美诗” //120

失去“故地”的时代，诗人何为 //131

二维码时代的诗歌：境遇、幻象与前景

在新世纪诗歌已经走完 15 年之际，对新世纪诗歌尤其是当下的诗歌评价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比如《文艺报》组织的西川、大解、臧棣、蓝蓝、刘立云等十诗人把脉当代诗歌：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专题研讨）。有研究者认为在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期和巨变期，诗歌仍然处于并不乐观甚至被诅咒的“乌鸦时代”（汪剑钊），甚至韩东认为 1980 年代以来的 30 年诗歌景观整体扭曲，只与西方有关的写作观念发生联系。有论者认为当下诗歌受到传媒、技术、资本和市场的影响太大了从而丧失了知识分子立场和批判意识以及先锋精神，如欧阳江河认为当下的“很多泡沫的东西、灰尘的东西，浮在的表面，浮在记忆的表面，所以我们的诗歌会是软绵绵的，会是带有消费性质，会是有点颓废，会是有优美，很伤感很自恋很自我的一种崇高，很可能是一种幻觉”。确实，当下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转型（比如城市化进程、生态危机、乡村问题）使得诗歌写作必须做出调整和应对，甚至一定程度上对赓续的根深蒂固的写作模式和诗歌观念进行校正，尤其是在新闻化的现实境遇面前，对于诗歌这一特殊的“长于发现”的文体类别，在媒体营销式话语充斥每一个人生活空间的年代，找到一首整体性的言之凿凿的具有“发现性”和

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诗歌其难度是巨大的。

据相关统计微信使用数量已达7亿之多，诗歌正在进入“微民写作”和“二维码时代”——“人到盖棺时也很难定论/自己说不清楚，别人更不能/最简单的办法是，死后请一个匠人/把我曲折的命雕刻成二维码/算是我留给世界的最后一方印章/形状一定要刻成祖屋的窗棂/镂空的，百年之后/就把二维码安放在我墓碑的正中/扫墓人一眼就能扫出阴阳两维的苦/扫完码后，不忍离去的那位/估计是我的亲人，也可能/是我的仇人”（麦笛《我的二维码》）。

确实，这一两年来最受关注的就是微信自媒体不断刷屏的众多诗歌活动、事件（比如余秀华事件、“回答——中国当代诗歌手迹拍卖会”）、奖项（各种杂七杂八的诗歌奖项达百种以上）、诗歌节、诗歌出版物（自主出版以及新近出现的众筹出版模式）和译介。据统计现在每天海量的集束型的诗歌产量早已经远远超越了《全唐诗》，而中国诗人的数量早已经跃居世界首位，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诗歌大国”。孙绍振在《当前新诗的命运问题》中就认为“没有一个时代，诗的产量（或者说新诗的GDP）加上新诗的理论研究，达到这样天花乱坠的程度，相对于诗歌在西方世界，西方大学里备受冷落的情况，中国新诗人的数量完全可以说是世界第一”。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每天都在激增的诗歌微信公众号和微信群给诗歌生态带来的不容忽视的影响，甚至自媒体被认为给新诗的“民主”带来“革命性”影响。在碎片化、电子化和APP移动临屏阅读语境下即时、交互性的诗歌写作、阅读和批评都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即时性、日常化和大众化。由此诗歌在公众中的地位和形象有所改变——诗歌回暖，诗歌升温，诗歌繁荣，诗歌重新回到社会中来，诗人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被空前拉近。面对着这些被各种文化机制推动的诗歌活动，我们似乎正在迎接一个“诗歌活动”已达高峰

期的时代。得出“活动多，好诗少”这样的结论是有其依据的。然而，我们必须回应的一个近乎老生常谈的话题——在谈论诗歌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这个问题会变得愈益重要和不可避免。在诗歌“活动”已达高峰期的时候研究者应对以上的诗歌判断做出审慎分析，而不要急于下结论。自媒体平台下的微信诗歌在提供了写作热潮和新闻事件的同时，也让我们思考其现实境遇、不可靠的幻象和可能性前景。

与小说等其他文体相比，一百年来的新诗共识度和自信力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甚至很多时候招致大众和读者不满与批评的恰恰是诗歌。新诗一百年，其合法性在哪里呢？这似乎又到了重新为新诗辩护的时候了。这既涉及诗歌的“新现象”又关乎新诗发展以来的“老问题”。围绕着时下一些新的现象和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在新与旧的对话中我们重新来面对汉语新诗的场域就显得非常必要——这既是美学的问题又是历史的问题。

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诗歌”与“大众”之间的平行或天然的疏离关系，诗人不在“理想国”之内。但是一旦诗歌和“大众”发生关联往往就是作为诗歌噱头、娱乐事件、新闻爆点。这又进一步使得诗歌在公众那里缺乏应有的公信力。然而被专业人士指认为缺乏基本诗歌常识的大众对诗歌和诗人的印象和评说往往令人匪夷所思、啼笑皆非，但最终失败告终的仍然是专业诗人、读者和评论家们。我们更多的时候已经习惯了将一首诗和一个诗人扔在社会的大熔炉中去检验，把他们放在公共空间去接受鲜花或唾液的“洗礼”。对于中国文学场域来说，很多时候诗歌是被置放于社会公德和民众伦理评判的天平上。而公共生活、个人生活以及写作的精神生活给我们提供的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诗人如何站在生活的面前？一首诗歌和个体主体性的私人生活和广阔的时代现实之间是什么关系？



每当面对一年来的诗歌，我们总会满怀期待地想梳理它的“新面貌”，似乎今年的诗歌与去年和往年的总会有所不同、有所“进步”。实际上，诗歌正离我们远去，诗歌正在远离读者以及诗歌的边缘化、写诗的比读诗的多、大众读不懂新诗，这些声音这么多年来一直伴随着新诗的发展。很多人对当下诗歌的最大观感就是诗歌很热闹，而且是不一般的热闹。在各种诗歌活动和诗歌事件中，尤其是微信强大力量的推动下，似乎睽违的1980年代的朦胧诗热潮几十年之后再次降临，诗歌重新又回到了“读者”和“社会”中来，诗歌再次高调地走向了公众视野，新诗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被空前拉近了。确实，以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对诗歌生态的影响已经成为现实，似乎每个人都成了毫无差别可言的“手机控”“微信迷”和“屏幕人”。近两年的诗歌在微信自媒体的推动下频繁进入到了一个个火热沸腾的社会现场，诗歌技术空前成熟，诗人的地区和国际交流日益频繁。这似乎成了近两年中国诗歌的标志。

那么，诗歌真的“回暖”“升温”“繁荣”了吗？

就此问题，每个人的观感和判断并不相同。

支持者高呼雀跃认为新媒体尤其是微信给诗歌带来了民主、进步和自由的福音。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中国首部微信诗选》和《处子》（首部微信群诗选）的推出以及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微信圈。反对的声音则认为微信平台上的深度阅读已经不可能，“新诗和读者的距离，这几年虽然有所缩短，但是仍然相当遥远，旧的爱好的者相继老去，新一代的爱好的者又为图像为主的新媒体所吸引。”（孙绍振《当前新诗的命运问题》）而黄灿然则认为只要你想读书即使微信上也可以进行深度阅读。显然，新诗与新媒体的关系已经被很多研究者提升到了“命运”这样大是大非的程度。著名诗人北岛更是认为新媒体所带来的是新的洗脑方式和粉丝经济，甚至成了一种“小邪教”，“某些作家和学者不再引导读者，而是不

断降低写作标准，以迎合更多的读者。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导致我们文化（包括娱乐文化在内）不断粗鄙化、泡沫化。在我看来，‘粉丝现象’基本上相当于小邪教，充满煽动与蛊惑色彩。教主（作者）骗钱骗色，教徒（粉丝）得到不同程度的自我心理安慰”（《三个层面看生活与伟大作品之间“古老的敌意”》）。

“传媒话语膨胀时代”的微信平台因为取消了审查和筛选、甄别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诗歌多元化发展，使得不同风格和形态的诗歌取得存在合法性的同时也使得各种诗歌进入到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失范状态，随之也降低了诗歌写作与发表的难度。微信等自媒体并不是一个“中性”的传播载体，正如希利斯·米勒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所强调和忧虑的那样，“新的媒介不只是原封不动地传播那内容的被动母体，它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被‘发送’的对象，把其内容改变成该媒体特有的表达。”所以一定条件下新媒体自身的“传播法则”会对诗歌的观念、功能、形态以及话语形式和评价标准都会产生影响。就当下诗歌来看，写作者、评论者和传播者的表达欲望被前所未有的激发出来，“自由写作”“民主写作”“泛化写作”“非专业化写作”正在成为新一轮的神话。

“微信诗歌”作为一种新现象当然需要时间的检验，需要进一步观察、辨析和衡估，但是就已经产生的现象、问题和效应来看，也需要及时予以疏导和矫正。软绵绵甜腻腻的心灵鸡汤的日常小感受、身体官能体验的欣快感、新闻化的现实仿写以及肤浅煽情的“美文”写作大有流行趋势。一定程度上新媒体空间的诗歌正在成为一种“快感消费”，这与娱乐化的电视体验类节目的内在机制是同构的——每个人都能够在新媒体空间亲自体验各种诗歌讯息。微信诗歌话语的自身法则使得点击量、转载率的攀比心理剧增，也进一步使得粉丝和眼球经济在微信诗歌中发挥了强大功能。这使得诗

歌生态的功利化和消费性特征更为突出，而“以丑为美”“新闻效应”“标题党”“搜奇猎怪”“人身攻击”“揭发隐私”的不良态势呈现为不可控的泛滥，其中文化垃圾、意见怪谈更是层出不穷。即时性的互动交流也使得诗歌的评价标准被混淆，写作者和受众的审美判断力与鉴别力都在受到媒体趣味和法则的影响。

在“无限制性阅读”中每一个写作者都可以成为信息终端，写作的匿名和无名状态被取消，人人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发言，每个人都可以同时充当运动员和裁判员的角色，所以微信在一些诗人和研究者那里被认为给诗歌带来的最大利益和进步就是“民主”。这一民主化的平台极大地推动和刺激了各个职业和社会阶层的普通写作者，甚至带有普及性的大众化的正在进一步扩大范围的“非专业写作”已经成为一股潮流。

而微信这一“写作民主”的交互性代表性平台已经催生了“微信写作虚荣心”，很多人认为只要拥有了微信就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甚至滋生出了偏执、狭隘、自大的心理。与此同时，电子化的大众阅读对诗歌的评价标准和尺度也起到了作用。由此引发的疑问是诗歌真正地解决“普及”和“大众化”问题了吗？碎片化时代的诗歌写作是否还具备足够引起共识和激发公信力的能力？尤其是在新媒体平台上海量且时时更新的诗歌生产和即时性消费在制造一个个热点诗人的同时，其产生的格雷欣法则也使得“好诗”被大量平庸和伪劣假冒的诗瞬间吞噬、淹没。与此相应，受众对微信新诗和新媒体诗歌的分辨力正在降低。

而如何对好诗进行甄别并推广到尽可能广泛的阅读空间，如何对新媒体时代的诗歌做出及时有效的总结和研究就成了当下诗歌生态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与难题。新媒体平台也使得新诗的跨界和立体传播成为可能，而国内首档电视诗歌跨界真人秀节目四川卫视推出的“诗歌之王”显然是要将“边缘化”的诗歌与“大众”结合，

而诗人与歌手的搭台（现场作诗、现场谱曲演唱）以及全国设立预选赛站点也显而易见是迎合了娱乐化的内驱力。

与这种诗歌“日常化”“大众化”和“非专业化”相应，一个重要的写作趋向就是以余秀华、许立志、郭金牛、乌鸟鸟、老井为代表的“草根诗人”的“崛起”和大量涌现。而微信等自媒体又对这些“无名诗人”“草根诗人”“工人诗人”的推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余秀华和许立志，而二人背后的社会身份、阶层属性、可供消费性阅读的生存故事、命运背景以及大众媒体的阅读心理实则值得进一步探究与反思。

由社会关注度极高的“草根诗人”“工人诗人”写作，我们注意到诗人对现实尤其是社会焦点问题和公共事件的关注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而直接。这一定程度上与媒体开放度有关，比如天津氰化钠爆炸后很短时间内就出现了几十万首的诗歌，但是这些与社会新闻和公共事件直接相关的写作几乎没有可供持续传播和认可的代表性诗作，这些诗歌可能比那片废墟看上去更像是“废墟”。而对生存问题的揭示，对生态环境的忧虑似乎正印证了一句当下最为流行的话——雾霾时代诗人何为？而当下对“诗人与现实”“诗歌与生活”问题的热度不减的争议使得写作者对“现实感”的理解发生分歧。一部分人强调诗歌的“介入”“见证”“及物”“现实性”，强调每一个人都应该站在现场和烟尘滚滚的生活面前，将自己纳入到工厂甚至上千度的高温中去感受生活的残酷性；另一部分则认为诗歌应该保持独立性和纯粹性以及个体主体性，认为应该重新对“生活”“现实”“时代”进行衡估和再认识，也就是说难道有诗人是在“生活”之外写作吗？实际上二者各持的观点并非水火不容，关键之处是应注意到诗歌的“现实感”最终是“语言的现实”，因为诗歌的语言不是日常交际和约定俗成的，而是生成性和表现性的。而我们看到的则是微信话语、新闻话语和日常话语等“消息性语言”